



梁启超

讲

阳明心学

听许葆云（《王阳明三部曲》著者）
与王阳明、梁启超跨时空交流
体悟心学的现实意义

梁启超◎著 许葆云◎评注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梁启超



阳明心学

梁启超◎著 许葆云◎评注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梁启超讲阳明心学 / 梁启超著. -- 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224-10811-8

I. ①梁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心学 — 研究 — 中国 — 明代 IV. ①B24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8888号

梁启超讲阳明心学

梁启超 著

许葆云 评注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 / 32

印 张 9.75

字 数 208千字

版印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10811-8
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前言

《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》是梁启超先生于1926年所作的关于阳明心学的一部专著，内容翔实，见解独到，对后世研究阳明心学有着重要的影响。但因为其书篇幅有限，且文字较为晦涩，所以专门做了一简单的评注，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。

许葆云

目 录

梁启超传略	— 001
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 引论

一、打破罐头	— 013
二、口号的价值	— 023

第二章 知行合一说之内容

一、“假的朱学”	— 039
二、两张面孔	— 056
三、假货买卖	— 069
四、一个工夫	— 088

第三章 知行合一说在哲学上的根据

一、最重实践的唯心论者	— 115
二、穿长衫的“孔乙己”	— 125
三、此花不在尔心外	— 139

四、大人者	— 148
五、正统邪说	— 160
六、宜动不宜静	— 178

第四章 知行合一与致良知

一、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	— 189
二、见满街都是圣人	— 200
三、扎硬寨，打死仗	— 214
四、一点灵明，扩充到底	— 225
五、义利之辨	— 249
六、物我合一，心外无理	— 274
七、人生当立志	— 287

王阳明年表	— 300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梁启超年表	— 303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梁启超传略

一、青年时代

中国这个国家，非乱世不出俊杰。而清末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孕育出一大批英雄豪杰之士，其中广东学子梁启超脱颖而出，成为近代社会民主改革的先行者，以旧国学之传人而成新国学之宗师，执学术牛耳，为时代先锋，可以称之为新时代学界的一代伟人。

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，字卓如，号任公，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一户殷实农家。梁启超自幼聪明过人，四五岁开始学习“四书”“五经”，到12岁已在乡里小有名气，16岁进两广总督阮元所立的“学海堂”就读。当时广州除学海堂外，还有菊坡精舍、粤华书院、粤秀书院、广雅书院，合称为五大书院，而梁启超除了在学海堂就读外，同时还是菊坡精舍、粤秀、粤华三所书院的“院外生”，同时就读四院，且在学海堂就读四年，考试皆列全院第一名，并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17岁时在广东乡试考中第八名举人，其才气之高，精力之盛，让人惊讶。

中举第二年，梁启超赴京赶考，未中进士，回乡路经上海，偶然看到了介绍世界地理的《瀛环志略》，这才知道原来还有地球一说，以及五大洲、欧洲诸国之名，非常兴奋，又看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各类西

方书籍，却因手头拮据无法购买，怏怏而归。但也正是这一次小小的偶遇，改写了梁启超的人生之路。

19岁时，梁启超离开学海堂，拜广东名儒康有为为师。第二年，康有为创设万木草堂，19岁的梁启超成了万木草堂的助教，自此追随左右，深得康有为的器重。在万木草堂的四年是梁启超人生事业和学术的转折点，眼看国事日非，而全国上下几亿人却仍在梦中，“举国之大，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，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”。鉴此时局，梁启超决定放弃旧学，接受维新变革思想与政治主张，由此踏上一条成为政治理论家、宣传家和新国学宗师的道路。

二、变法先锋

1894年，梁启超进京，同年甲午战争爆发，中国惨败，自此“万马之足，万铎之刃，相率而向我”。这一场大败彻底震惊了国人，使这个千年沉睡不醒的老大帝国猛然惊觉。年仅22岁的梁启超开始投身政治，在京城奔走，希望于国事出力献策。然而人微言轻，所有奔走全部落空。第二年春，梁启超准备参加会试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消息传来，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京城发起“公车上书”，18省举人1200余人聚于松筠庵，起草万言书，请求朝廷拒和、迁都，变法，成为清朝200年未有之事。梁启超在其中奔走，策动广东举人率先上书，又追随康有为在北京、上海办起“强学会”，成为一时领袖人物。

然而此时的清廷保守昏暗，毫无生气，北京强学会还未办起就遭封禁。梁启超眼看难有作为，更感觉中国的问题在于保守陈腐：“虽

合无数聪明才智之士以应对，犹恐不得当，乃群无脑、无骨、无血、无气之俦，偃然高坐，酣然长睡于此世界之中，其将如何而可也？”于是在第二年到上海担任《时务报》主笔。《时务报》共出69册，前55册中梁启超共发长短文章60篇，批评时政，大谈“废科举，兴学校，民权论”，倡议“法者，天下之公器也，变者，天下之公理也”，文笔锋利，声名鹊起。在梁启超的主持下，《时务报》风靡海内，“举国趋之，如饮狂泉”，却由此引发了梁与清廷实力派人物两江总督张之洞的矛盾，最终被张之洞的幕僚——《时务报》经理汪康年排挤，出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十月，德国强占胶州湾，十一月，俄国占领旅顺、大连，眼看国家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，梁启超又赴京追随康有为请求变法，联合各省举人联名上书，提出“吾中国之亡，不亡于贫，不亡于弱，不亡于外患，不亡于内讧，而实亡于士大夫之议论，之心力也”。终于促使光绪帝颁下“明定国是”诏书，宣布变法。从此梁启超与康有为并称于世，名动中华。

然而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本身却问题极多。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仍然大权在握，虎视眈眈，追随着光绪帝身边的人也来历复杂，既有以康有为为核心的“康党”，又有翁同龢、徐致靖、林旭、刘光第、杨锐、杨深秀、谭嗣同、李端棻这样的“帝党”，还有孙家鼐、张之洞、陈宝箴、袁世凯这样的重臣。“康党”是变法最激烈的拥护者，但一个个人微言轻，无法挤进权力核心；帝党支持变法，无非是死心塌地支持光绪帝；而实力派重臣却一个个立地观望，摇摆不定。结果

注定这场维新运动迅速走向失败，保守派重新掌权，捕杀谭嗣同等“六君子”，下令捕拿康梁。梁启超和康有为出逃日本。

流亡之后的梁启超，一开始所有心思都放在怎样营救“圣主”光绪帝上头，但很快，他就感觉到一种“新知”在身边跃动。梁启超开始学习日语，并对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、中村正直、江中兆民、伊藤博文、大隈重信、德富苏峰、加藤弘之、深山虎太郎等人的思想产生极大兴趣，从此，他自己的思想也从单纯地“拥立皇帝以求变法”开始向更高的民主层面转进。

在日本，梁启超开始大量著述，先办《清议报》，再办《新民丛报》，思想日新。在《清议报》第100期所写的祝词中大谈“倡民权，衍哲理、明朝局、厉国耻”，认为“此四者，实惟我《清议报》之脉络之神髓”，一言以蔽之曰：“广民智、振民气而已。”又对“国家思想”做出如下总结：“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；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；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；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。”强调“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”，国民必须“备有人格，享有人权，能自动而非木偶，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，为现今之民而非远古之民，为世界之民而非陋谷之民”，这些思想已经逐渐摆脱旧说，对梁启超来说，一个新思维，一种新学术，已渐渐萌芽了。

也在这一时期，梁启超与康有为正式决裂。

三、从政生涯

自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梁启超出亡海外，先是提出“新史学”观点，

对中国历史展开深度探讨，著述日丰，继而渐渐接受西方思想，研究西方哲学，又赴美国考察现代工业，与孙中山和革命党接触，提出“新民说”，思想不断更新，然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思想上却毫无变化，反而变成了一个死硬的“保皇党”。

康有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，但性格刚愎自用，随着在政治上的连连受挫，康有为变得越来越霸道专横，心胸日趋狭隘，已不能成大事。在学术上，康有为早年推崇西学，大量购买“西书”，俨然一位锐意革新的时代先锋，到后来却斤斤计较于“今古文之争”，成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。于是梁启超联合一些朋友给康有为写信，请他“息影林泉”，康有为见信大怒，从此成见日深，以至水火不容。

脱离康有为的阴影之后，梁启超在新学说的道路上越走越快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在新思想方面却有些跟不上时代了。

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和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名人，梁启超从思想上不容易放下“光绪皇帝”这个包袱。虽然他与孙中山相识后关系一直不错，可是在思想上却并不能完全成为一个“革命党”，反而在潜意识中与革命党为敌，有一阵子梁启超住在孙中山家里，却在孙中山的“兴中会”里大讲“保皇”，拉革命党人入伙，结果闹出一场冲突，导致梁启超和革命派走向决裂。

1903年以后，由于思想上的局限，梁启超的影响力开始下降，青年学生们开始不买他的账，在与革命党言语文章的争论中，梁启超所代表的“保皇”旧思想也被驳斥得理屈词穷，无法立足。这些挫折使梁启超一度沉默下来，经过一场反思，梁启超于1905年提出了著名的《开明

专制论》，认为国家可分为专制国家和非专制国家两种，而非专制国家“一国中人人皆为制者，同时人人皆为被制者”，权利义务基本相等，它可以是“君主贵族人民合体”，也可以是“君主人民合体”，或者完全是“人民”的，并认为，相较是言，非专制国家制度要优于专制的国家制度。并且梁启超断言中国是一个“不完全之专制国”，别说“非专制国”，就连一个“专制国”都算不上，只是一个烂摊子。

由此，梁启超推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：“中国今日，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，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，则必先以革命。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，而反以得专制。”所以中国今日不但不能行共和，而且是“万不能行共和立宪”。结果《开明专制论》在社会上引发了一片骂声，使得梁启超的声望更不如前了。

其实梁启超推出《开明专制论》，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保守，同时却也有他的想法，梁启超是想以这篇文章拉近与清政府的关系，策动清廷推行宪政，而清廷也确实在1906年宣布“预备立宪”，这么一来，以梁启超为首的“维新派”又乐观起来，先后组织了三次请愿，又在1907年组建“政闻社”，并写了大量的宪政论文，就等着中国像日本一样，搞一次成功的君主立宪了。

但梁启超对清廷的期望显然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最终在拖延了五年以后，清廷到1911年5月却推出了一个“皇族内阁”，让全国人都看清了朝廷的“立宪”实为一场骗局，这让梁启超彻底醒悟过来，1911年他发表《新中国建设问题》一文，承认“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”。

然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觉悟总体来说是幼稚的，当清廷被推翻之

后，他又一次对袁世凯抱有幻想，甚至追随袁世凯担任了司法总长，但做不多久就辞职了，其后又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，做到1915年又一次辞职，其后梁启超再一次觉醒，和袁世凯决裂，支持他的学生蔡锷起兵反袁。袁世凯倒台后，梁启超又于1917年在段祺瑞政府里担任财务总长一职，但只三个月就又一次辞职离去，从此基本退出了政坛。

从“公车上书”到退出政坛，梁启超前后参政二十多年，但事实证明他的头脑、思想很先进，学说也很先进，政治上却显得幼稚保守，并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才。同时梁启超也不善经营，办《新民丛报》时就因为财务问题而垮掉，后来经营广智书局，又是赔得一塌糊涂，不得不倒闭了事。

四、国学巨匠

1918年梁启超赴欧洲游历，到1920年后，从政坛上彻底“退下来”的梁启超进入清华学校讲学，回到了已经久违的学问中来。此时的梁启超已届中年，历经坎坷，心态渐趋沉稳。然而眼看国家经历多年宪政革命之后，竟是一事无成，满目疮痍，当年的强国之梦已成一枕黄粱，多年为之奋斗奔走理想成了镜中花、水中月，这使梁启超一度感到消沉。

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，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使梁启超看到了欧洲列强的另一副嘴脸，这才明白以前对西方文化思想的推崇有些过头了，这些凶悍的列强说到头来，无非弱肉强食的强盗面目，而残酷的经济危机，战争的巨大破坏，都让梁启超感到困惑，甚至断言“西

方经济之发展，全由于资本主义，乃系一种不自然状态，并非合理之组织。现在虽十分发达，然已将趋末路，且积重难返，不能挽救，势必破裂”。而中国人“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，在没有法治精神。拿一个一个的中国人和一个一个的欧美人分开比较，无论当学生，当兵，办商业，做工艺，我们的成绩丝毫不让他们。但是他们合起十个人，力量便加十倍，能做成十倍大规模的事业，合起千百万个人，力量便加千百万倍，能做成千百万倍大规模的事业。中国人不然，多合了一个人，不唯力量不能加增，因冲突掣肘的结果，彼此能力相消，比前倒反减了。合的人越发多，力量便减到零度。所以私家开个铺子都会赚钱，股份公司十有八九要倒账，很勇敢的兵丁，合起来做个军队，都成败类。立宪共和更闹成个四不像。总之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，到中国人手里，总是一塌糊涂了结。但是没组织的社会和有组织的社会碰头，总是挤不过去，结果非被淘汰不可”。这一大段评论和指责，几十年后看来仍然犀利而正确，但从中也感觉到梁启超内心的茫然与困惑。

梁启超一直是个高明的学者和幼稚的政客，虽然走南闯北，眼界开阔，可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了解并不深，也实在拿不出好的具体的改革办法，灰心之下，彻底退回学术界，开始以讲学为重，同时发愤著书，仅1920年一年就完成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《墨经校译》两书，推出《老子哲学》《孔子》《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》《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》《佛教与西域》《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》《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》《政治运动之意义与价值》等论文，其中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一书影响极大，其后又推出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和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，从此每年都有

大量著作问世，内容涉及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王阳明、朱舜水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颜元、戴震、章学诚、魏源、龚自珍、康有为、谭嗣同、黄遵宪、夏曾佑等名家，到去世时，著述共达1400余万字。

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济南、武昌、长沙、南通等地进行二十多次学术演讲，内容极其丰富，第二年创办文化书院，自任院长，之后又在南开大学、清华学校、中国大学讲学，其后被确诊患上了心脏病，身体每况愈下。1926年因病割去右肾，1928年11月病情加剧，转入协和医院就医，1929年1月19日逝世。

第一章

引论